

政治哲学与西方政治认识的“内核”

——评金林南《西方政治认识论演变》

谢 勇,谈育明

(河海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8)

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4970(2010)02-0085-03

一、政治与哲学的“博弈”——政治哲学对政治思想史的阐释

当政治哲学经过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 1899~1973)的治疗似乎得以死而复生并逐步进入“中心话语”^[1]时代以来,研修西方政治文明的学者的认识似乎正在慢慢渗入西方政治文明的内核。当然,以下情况依然存在,很多志在洞察并学习西方政治文明的文人志士似乎并没有跟上政治哲学时代的步伐,他们在面对西方文明时依然是“隔岸观火”般遥远而又朦胧,仍总是以旧有的惯性视角审视以西方政治文明为主导时代的迷幻图景,在奔向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道路上,他们是如此的“急功近利”和“饥不择食”,任意捡取一块块无味的“面包”以蹒跚前进。

如果说政治学“行话”与政治时代的命运休戚相关,那么在施特劳斯引领的政治哲学思潮中,他们触及或贡献了怎样的政治“行情”和政治学“行话”的关节点呢?换言之,他们创造了哪些政治哲学学术语来阐释政治的命运?毋庸讳言,诸多学者在面对政治现象的解读或阐释时,总是“嫁接”或“互套”西方的某种政治理论,而不是刨根究底去追究那个源头性的东西,缺乏深思和反思是我们在认识西方文明过程中的主要症结之一。

金林南的博士论文深刻洞察到了并尝试摆脱这种“症结”,因为他试图不再“隔岸观火”式地观摩西方政治文明,而是像探究自己的眼睛一样以“反思性”的思维方式去解读西方政治文明,探觅西方政治理性的内在规定。以他的博士论文为主体的著作《西方政治认识论演变》是在这个“死而复生”的政治哲学时代走向西方政治文明深处的鲜艳奇葩。尽管拥有“默会的知识”的金林南博士在书中将“政治科

学”、“政治史学”和“政治哲学”3种“范式”各有凸显,但笔者认为作者似乎更迷恋政治哲学范式,或者说他更受施特劳斯的启示。因为金林南博士似乎也像列奥·施特劳斯一样认为,在社会科学中“价值”和“事实”几乎根本不可能分离;“价值”不可能摆脱“事实”完全“中立”,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必然会转变为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因此,正如作者在书中所勘定的那样:“政治认识是为政治世界寻找‘阿基米德点’的活动。”^[2]“政治研究就应该是一种历史研究、比较研究和哲学研究”^[2]。

“政治认识论以政治认识为研究对象,是政治认识的认识或政治知识的知识。”^[2]这是作者开篇的话语,在阐述政治认识的主客体和政治认识层次之后,作者担忧的是政治认识论本身也是一种政治认识,这样就会出现解释学意义上的“无限制后退”或“恶循环”。所以,为说明政治认识论本身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作者借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之口在《卡尔米德》的对话中揭示了政治认识论主要的思维特质,即追思和返思性。在哲学理性的母体中孕育并诞生的西方政治认识天然的具有内在的矛盾和张力,因为它在追求确定性、永恒性及形而上的终极目标时也没有抛弃掉政治世界所固有的那种不确定、暂时性和形而下的本质。简言之即“知识的统治”和“统治的知识”具有天然的张力和矛盾;“所谓‘知识的统治’是指以知识的方式处理政治,包括以知识的标准设定政治的基础、以知识的理想代替政治方案、以知识人作为主要的统治精英等等,所谓‘统治的知识’是指以政治的方式处理知识,包括政治情境对知识的刻画与渗透、知识成为统治技术和手段、政治借助于知识获取合法性资源等等”^[2]。从文化上的无意识和理论上的不自觉出发,金林南先生向我们揭

示了“知识的统治”和“统治的知识”这对基本的内在“博弈者”始终是推动西方政治认识发展的历史“车轮”，以及“车轮”所到之处被赋予的新的历史造化。这一基本内在张力塑造着西方政治思维，作者将此巧妙地嵌入全书使其成为我们理解西方政治文明之河的一条内在逻辑链条，并循着这根逻辑链条使我们徜徉在“河床”的风景中，领略到西方政治文明维特根斯坦式“世界图景”的美。

二、“知识的统治”与“统治的知识”—— 西方政治文明的内核

在该书的第一章，作者从遥远的古希腊世界出发，通过对政治认识条件的分析，向我们揭示了在信仰精神占据支配地位的古希腊世界“理性”的发轫是如此的悲喜交加。可喜的是理性这把“钥匙”为真正自我认识之“锁”开启了那生锈的闸门，吊诡的是理性的生成同时也带来了哲学与城邦政治的抗衡、哲人与公民的冲突。继而，作者以古希腊两位先哲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观为个案，表明在柏拉图那里现实的城邦与理念的城邦之间似乎天然地有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正是这条鸿沟使其“理想国”无安身立命之所。为此柏拉图不得不通过那“高贵的谎言”来弥补现实城邦与理念城邦之间的鸿沟，在自己“挖掘”的那个“洞穴”中，柏拉图的哲人从城邦上升后又不得不下降到城邦，最终通过对“爱智”欲望的节制，又回归到此岸现实的“影像城邦”。这样一来“使哲学和哲学家‘下降’，从而使‘知识的统治’向‘统治的知识’的转变”^{[2]184}，进而达到“现实”与“理念”之间的“和谐”。面对亚里士多德，通过对“自然的城邦”和“城邦的自然”之间紧张关系淋漓尽致的刻画，金林南博士依然在向我们书写着“理性”与“城邦”的紧张关系和断裂地带。他认为，为修复这种紧张关系，亚里士多德把世界划分为人事世界和非人事世界，并为人事世界中的人们提出实践理性这种对后世西方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理性形式，其目的和意义如作者所言：“一方面继续坚持理性在城邦中的支配作用，另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弥合、缓解了苏格拉底、柏拉图的政治理论中出现的知识理性的普遍性、永恒性、理想性与城邦政治的特殊性、变动性、现实性之间的‘断裂’和张力”^{[2]183}。当我们在作者的指引下从“河床”的上游漫步下来时，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美景，即罗马和中世纪这块风景被作者完全涂画在同一幅绚烂的画布之上，它呈现给我们的是一种“二元的政治结构”。众所周知，“言必称希腊，行必看罗马”这种旧有惯性力量曾是如此强大，但它却丝毫没有牵制作者将它们涂画在不同的

画布上，并坚称罗马与中世纪拥有相同的政治思维结构。作者如此强势的理论假设无论如何也不能不将此看作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和创新，当然，这种尝试和创新的背后谁也无法排除作者本人思想意识中充斥着斯多葛学派巨大影响。如果说在古希腊时代政治认识在“知识的统治”和“统治的知识”之间具有内在的某种张力，那么在罗马、中世纪这种张力是否得以继续存在？显然，作者认为这种张力并未随着时代历史的终结而终结，因为“在中世纪的政治认识中，由于神学信仰具有绝对优位性，政治认识只能被置于神学信仰之下，我们可以把中世纪的政治认识认定为‘政治神学’”^{[2]187}。为了更好地阐释作者话语下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神学在西方政治认识论中的转换这一事件，西塞罗、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为我们现身说法。在西塞罗的政治认识世界中，自然法理论和对哲学的沉思所设定的完美世界与历史所展示的现实政治世界遥隔千里，在奥古斯丁的神圣秩序中，上帝的神圣理性与世俗的现实世界始终是有天壤之别的；在托马斯·阿奎那政治观中，自然法对政治生活的指引和人法对自然法的具体化之间也始终存在着裂缝。在他们的说教中，我们又清晰地发现西方政治认识的基本视角发生了两个层面的转换，即整体主义被个体主义、世俗理性被神圣信仰所置换。同时，政治观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尽管那根内在的逻辑链条即“知识的统治”和“统治的知识”被赋予新的不同的时代内容，但其内在的张力却依然如故。

顺着金林南博士对各个时代政治认识“档案”的层层解密，似乎我们时刻都在跟自己这个“敌人”做着斗争，即为抛弃固有的政治认识的惯性时还要在这种弥漫内在张力的战场上不至于迷失自我。最后一章作者以列奥·施特劳斯对马基雅维利的评判打开自己的视野，继而论述主体性悖反和西方世界观的格式塔转换：“一是具有自我超越性的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自然理性逐渐隐退，它逐渐被具有丰富主观感受能力的个体理性所替代；二是被古希腊自然理性深深影响的‘理性’的上帝被充满自由‘意志’的上帝所替代，这导致充满上帝创世理性的必然的世界逐渐被充满任意‘偶然性’的世界所取代”^{[2]160}。其实，这种转换结果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不仅仅是内在张力推动的结果，当人的自由意志被松绑时不转换才是更不可思议的。在论述休谟问题时作者无疑是在向我们阐明西方政治认识论在近代主体性基础上的一次自觉和理论上的反思。显然，康德通过对理性的划分实际上就是作者表达主体性凸显的一种意识，那么，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在作者笔下登上

舞台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凸
显的“理性与价值、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普遍利益
与特殊利益之间的基本矛盾关系”^{[2][31]}也就是“知识
的统治”和“统治的知识”内在的矛盾和张力,这是西
方现代性政治认识的矛盾张力。

三、哲学的“温良”——政治哲学的自我反思

如果把勾勒西方政治认识论的“内核”看做一场
游戏,似乎作者本人设置的游戏关卡是一种有意的
选择,因此一个问题浮现在笔者脑海:是不是在奔向
迷离圣地道路上所有风景都可以用“知识的统治”和
“统治的知识”这条逻辑链条串一串?假如有些“世
界图景”不能或不可以用这个视角透视,那么沿着西
方政治文明的“河床”漫步,我们还能进入西方政治
文明的“内核”吗?

学术乃天下公器,一部书出版以后,便不再仅仅
属于作者本人,它更多的则属于读者大众,故著作的
内容优劣与否应由天下人评判。显然,在奔向那迷
离圣地道路上,金林南博士的这部著作可谓百花之
中一朵鲜艳的奇葩,甚至可以说,作者对西方政治认
识的认识是对列奥·施特劳斯所倡导的古典政治哲
学的一种回归和响应。尽管对政治认识的认识可以
追溯至两千年前的古希腊精神中宁静清晰的理性主
义,但时至今日,政治和哲学的关系才略显眉目,政
治哲学既不是政治和哲学二元素的相容和简单相
加,也不仅仅是修辞语言上的“政治的哲学”和“哲
学的政治”,金林南博士的这部著作恰如其分地给我
们证明了这一点。让笔者略有遗憾的是,作者在大篇
幅地探讨西方政治认识后并未对中国的政治认识给

出任何细致而系统的解析,当然,这虽有可能性但确
实在作者的文章框架内没有丝毫的必要性,或许,作
者是在“隐微—显白”的写作技巧中再次回应列奥·
施特劳斯。

“政治”与“知识”、“哲学”之间除了天然的内在
张力外,还需要某种天然的亲和力。二者不管谁走
得太遥远、太极端,都会扭曲“知识”与“政治”之间复
杂的张力关系;“中道温良”的“政治”能为“知识”反
思能力的实现提供现象场域与支持辩护;“神圣癫
狂”的“知识”则通过反思批判和理念导引来解答其
政治场域内的一些超验疑惑,为其驾领德性良心,否
则,必将带来残酷的现实灾难。所以笔者认为,与其
说金林南博士在结语时显现出对中国政治现实的关
怀,还不如说其告诫我们“政治”与“知识”、“政治”与
“哲学”之间要保持一定的张力和亲和力,也许只有
这样我们方可更好地理解“统治的知识”和“知识的
统治”这条西方政治认识“河床”上的内在灵魂。更
难能可贵的是,在金林南博士勾勒西方政治认识内
核后,看到如此的“世界图景”后竟依然能够时刻用
理性规制自己的情绪而把“神圣癫狂”的知识进行
“祛魅”,以回归“中道温良”的政治现实,或许,正是
因为清晰地看到这番“世界图景”后才回归到“中道
温良”的此岸世界。

参考文献:

- [1] 陈晏清. 政治哲学的兴起与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
建构[J]. 中国社会科学, 2006(6):15.
- [2] 金林南. 西方政治认识论演变[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 2008.

(上接第84页)主要内容。其三,认为道德信仰危机
有两种不同的性质——发展型道德信仰危机和倒退
型道德信仰危机,我国改革开放所造就的社会进步
发展的大趋势决定了道德信仰危机以发展型危机为
主流,进而可以判断道德信仰危机具有进步的意义,
对道德信仰危机总体上应当持乐观主义的态度,但
同时必须高度重视公德滞后所带来的以私情作为处
理道德关系原则的私德替代以规则作为处理道德关
系原则的公德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私德对公德的
僭越是目前道德失范的主要原因。其四,以江苏省
为例的公民道德信仰状况的实证调查,具有较强的

代表性和说服力(因为江苏的苏南、苏中和苏北与中
国的东、中、西三部分的状况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相似
性)较为客观地掌握了公民道德信仰的现状及其发
展趋势。

《公民道德信仰理论及实证研究》一书围绕着道
德信仰所进行的系统理论研究和深入实地的实证研
究,以及通过理论演绎和实证分析提出的新见解,对
确保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体系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增强道德教育的感召力和吸引力、提高公民道德修
养的自觉性都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